

洋人居为奇货的产品。只要造出好的产品，大多数中国人一定会选择国货。沈鸿成功了，利用锁厂一天天壮大起来。正当沈鸿满怀憧憬，将业务拓展到机器和汽车制造，准备大显身手时，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将战火烧到了上海，给上海的工厂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国民政府和企业主自然不愿让上海的工厂设备落入敌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决定西迁工厂。沈鸿得消息后，立即建议股东将工厂设备一分为二，与制锁相关的设备留上海继续运作，机器制造设备和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专用机床，由他负责迁往大后方，为抗战服务。可他找到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办理内迁时，却被告知因经费有限，政府不扶持诸如利用厂这类规模较小的工厂内迁，如愿意内迁，只能自费相随。沈鸿在股东的支持下，决定自费随队内迁。

1937年8月25日晚，沈鸿租了两条民船，与师弟黄海霖及陈孝良等九名徒弟，带着十余吨重的十台机器、194件工具、18册技术书籍，从苏州河起航，在9月下旬到达武汉。可刚到武汉租下厂房，安装机器，办起了“利用武昌厂”，武汉也有了沦陷之虞。国民政府要求工厂继续内迁。但租船西进十分困难，还得打点当地黑白两道。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如此无能，沈鸿大失所望。一个偶然的机，沈鸿在武汉听了从延安采访回来

延安时期，在窑洞前留影的沈鸿（右）。



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演讲，了解了延安的情况，又遇到了在上海读夜校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同学陈振夏，沈鸿更知晓了共产党抗日主张和艰苦抗日，感到共产党才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希望，便决心奔向延安。

很快，沈鸿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表达了奔赴延安的意愿。12月27日，又到汉口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负责人钱之光商谈赴延安参加抗日的事宜。次日，沈鸿将商谈的情况致函在上海的利用厂董事会，表明在国家危急的情况下，武汉“人心依然只顾自己，一盘散沙，每怀前途不胜殷忧也”，表明“盖国家已至危之极点，我辈既生一日，万不能坐视一日”，八路军“愿无条件运陕，但祈机器不废置，而国家好多几分实力”，征求各股东意见。利用厂董事会很快复电同意，并委托沈鸿全权处理。但工厂迁陕并不容易，因为国民政府设定的企业迁移地址并不包含陕西，若迁陕西，必须由资源委员会另外出具通行证。在胡厥文等人帮助下，沈鸿来回奔波五次，费尽周折，终于取得了去西安的通行证。

1937年底，沈鸿与师弟和自愿前往陕西的六位徒弟，带着机器设备和工具、图书等，从汉口分两路向西安进发。一路用汽车运送机器设备等，由大徒弟陈孝良随车押运，一路由沈鸿带领坐火车。坐火车自然比坐汽车的先到西安。那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凡是运进陕甘宁边区的物资都要受到严格的检查，国民党绝不会轻易让利用锁厂的机器设备进入边区。为避人耳目，按照预定方案，沈鸿在西安上演了一出好戏。他们西装革履，风光体面地住进了西安最高级的西京招待所，随后前去拜访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建设厅张厅长。张厅长听说是资委会批准西迁的上海工厂的头面人物来访，自是非常高兴，又是为沈鸿接风洗尘，又是陪沈鸿前往西安市郊等地考察、选择厂址。周旋了大约五六天，沈鸿接到通知，押运机器的人马到了，让他们立即住进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从此，这位上海来的沈先生在西安失踪了。

1938年1月30日，正是腊月二十九，八路军办事处决定趁着过年时国民党军队值守检查比较松懈的时机行动。31日凌晨，大雪纷飞，五辆延安派来的汽车载着沈鸿等人和机器设备悄然离开西安。经过五天艰辛的历程，终于在2月4日农历正月初五到达延安。沈鸿和他的利用五金工厂创造了抗战时期上海唯一一家迁到延安的传奇。

当时的延安缺吃少穿，机器制造业更几乎是一片空白。沈鸿带到延安的那些机器等虽然平常，但因为有了制造机器的母